

雁阵惊寒

湖南衡阳文化大革命史事

主编 应山红



“文革”十年中，“牛鬼蛇神”挨斗、游街之情景时时处处可见。

市委书记杨兴洲



专员陈祥聚

岳健飞时任市委副书记



市长刘瑞兴等人游街，头戴高帽，左臂套“魔爪”



成铁侠、张维新
时任副专员



王守仁时任地委副书记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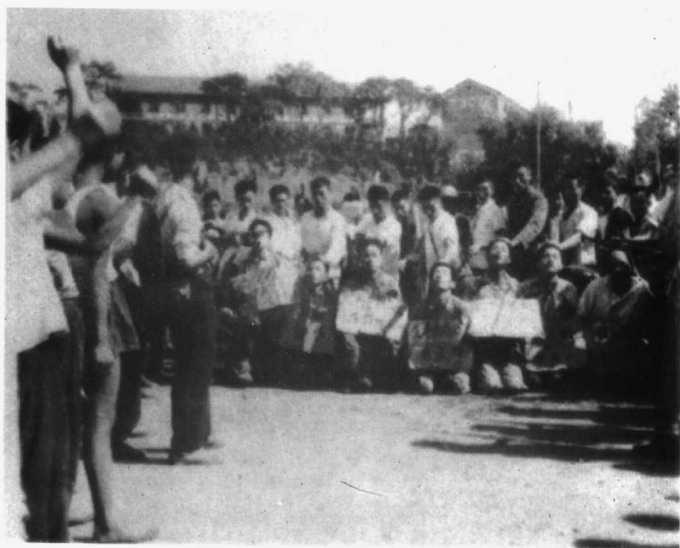
全市性批斗大游街

批斗场面之一





批斗场面之二



批斗场面之三



批斗场面之四



批斗场面之五

批斗场面之六



批斗场面之七



那年月，“政治压倒一切”，游行是家常便饭



红卫兵游行



工人游行



庆祝“新生红色政权的诞生”

欢呼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的发表





到五七干校去改造



造反派设在铁
工校的武斗据点

目 录

- (1) 前言 应山红
- (9) “文革”流行语浅释 刘维勤
- (39) 荣辱浮沉南柯梦
- 简介衡阳“文革”中的群众组织 彭一鸣、应山红
- (58) 十年天地干戈满 四海苍生痛哭深
- 简介衡阳“文革”中的武斗 彭一鸣、应山红
- (74) 火烧后院 祸起萧墙
- 简介衡阳地、市党政机关在“文革”中的动乱
..... 彭一鸣、应山红
- (88) 胡云初之死 崇 文
- (96) 十年一觉荒唐梦
- 简介外地红卫兵串连来衡参加“文革”的情况
..... 崇 文
- (102) 衡阳市八中的红卫兵运动 邓昌杰
- (130) 乱世入如蚁
- 衡阳“文革”中部分冤魂档案 应山红

(149) 文化大革命中的衡阳民主党派…………… 史 鉴

(155) 大革文化之命

——衡阳图书文物在“文革”中之劫难与抢救 …… 黄耀武

(166) 记中央文革密令逮捕的“政治要犯”杨介夫…………… 应山红

(174) 衡阳文化大革命大事记（初稿）

——附《拨乱反正》 …… 易 可 彭一鸣 应山红 廖祥骥

(250) “文革”笑话录 …………… 刘 啸 辑录

(259) 附录（一）《沧桑十年》序 ……………

…………… 季羨林（转载自《炎黄春秋》总第 123 期）

(263) 附录（二）“检讨”文化 ……………

…………… 沙叶新（转载自《随笔》总第 137 期）

(279) 附录（三）权力限制和权利保护……………

…………… 杨敏之（转载自杨敏之著《读权力》）

(292) 后记…………… 应山红

前 言

应山红

我与友人于1998年合作出版了反映本市“反右斗争”的《石鼓滩头》。一座中等城市的一群过来人，齐心协力收集、撰写本地区的“反右”史料并集结成书，这在全国也许是首创，可说是填补了中国“反右”史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吧！一个产品制作出来了，遗憾也跟着来了，书成后，察觉其中有不少缺陷，唯有徒呼奈何。但，无论如何，《石》书是有其一定的史料价值的，我坚信，时间愈久，其价值必将愈显其大。

《石》书面世后，有人提议再接再厉，出一本反映本市“文革”的书。我赞同，《石》书编审周济老很快想出了书名《雁阵惊寒——湖南衡阳“文革”史事》。唐王勃《滕王阁诗序》“雁阵惊寒，声断衡阳之浦”，言南下之雁惊寒，哀声彻于衡阳。此书名既点出了地域，又揭示了“文革”给衡阳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，很是贴切。

设想中的《雁》书不同于偏重于个人回忆的《石》书，拟编写一部本市“文革”的野史。通常认为官方编写的史书为正史，有权威性，无可怀疑；私家著的史书谓之野史，多是记载街谈巷议，逸闻趣事的闲书，只供消遣。我认为此说不确。问题不在于撰史人之身份，而在于他是坚持存真求实，对历史和人民负责，还是曲笔忌讳，只对权力负责。这方面的例子不少，教训甚多。

我浏览了1998年4月出版的《衡阳市志》。该书的《总述》有一段456字是专写“文革”的：“1966年6月，境内‘文化大革命’开始。林彪反革命集团煽动资产阶级派性，分裂工人阶级队

伍，搞乱思想，搞乱理论，搞乱组织，搞乱队伍，严重干扰、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。至1968年8月，境内工业总产值比同期下降38.68%……1971年后，境内广大干部群众排除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干扰，深入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运动，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，促进工农业生产和教育、文化、卫生、科技及商业、城建等各项事业的发展”。下面是列举的一系列数据：1978年底与1949年相比，境内粮食总产为3.5倍，农业总产值为251倍，工业总产值为40倍，大中专和中小学为112.5倍，在校学生为131倍，医疗病床为97.8倍。1978年底的商品零售总额为1950年的7.2倍。

对这一段综述，我认为有几点值得商榷：

(1)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《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指出：“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‘文化大革命’使党、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。这场‘文化大革命’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。”“对于‘文化大革命’这一全局性的、长时间的左倾错误，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。”中央的《决议》说得清楚不过了，故不必“为尊者讳”。

(2) 说“1968年8月境内工业产值比同期下降38.68%”，不知同期是指何年？

(3) “大寨经验”是不成功的，不宜肯定（参看《文革流行语浅释》第38条）。

(4) 《决议》指出：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斗争，使“文革”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，但我国国民经济还是遭到了巨大损失。《市志》应举出1978年与1966年相比的数据，如实反映“文革”十年的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状况。拿1978年与1949年相比，不能说明“文革”的问题。

我对正史中的一段记述妄加评论，是否就可以说《雁》书是

一部忠实地反映了我市“文革”全貌的信史呢？我只能十分遗憾地说，不是，远远不是。我起初确有这个雄心，但在做起来遇到重重困难后，信心大为动摇，甚至想歇手不干了。

中央对“反右”与“文革”的评价迥然不同，认为“反右”是正确的，必要的，只是在进行中严重扩大化了（对此论断有不少人提出质疑），而“文革”则是全盘皆错，必须彻底否定。按说，现在来写揭露、批判“文革”的文章，应该不会有什么思想障碍了，然而实际情况却不尽然，这是我事先没有预料到的。

撰史的首要条件是掌握足够的信而可征的史料。我从几方面入手，均大不顺利。

我访问了几位当年深受“文革”之害的熟悉较多上层情况的老同志。有两位已写了回忆录之类的文章，却不愿提供。有一位坦言：“‘文革’逼迫人们灵魂大曝光，有些人当年的表现确实不光彩，如果照实记下来，必会刺痛他们。过去是同事、熟人，现在呢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碰上了总得打个招呼吧！事情已过去几十年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都老了，平安宁静度好晚年吧！”“你说某某人当年做了损人的事，有些情节还相当恶劣，但他后来还是回到了台上；现在虽已退下，可是风光依旧，经常抛头露面。他的子女在衡阳，有的还是领导干部。即使我本人不怕得罪谁，也得为我的子女后代着想啊！”

我又采访了几位当年较大组织的头头。有的在头次见面时倒蛮客气：“对您老的精神表示敬佩！对您老的计划表示支持！”可是当我再次走访或打电话时，对方不是说忙就是说身体不好，口气不耐烦了。有的则很干脆：“要我写可以，但是要我从反思的角度写，对不起，做不到！毛主席说‘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，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！’我响应号召，何错之有？而且我所参加的××××，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。不过，坏事变好

事，我受处理后下了海，因为行动早，加之有许多‘死铁’帮忙，所以生意还算顺利。政治上吃了亏，经济上捞回来了，堤外损失堤内补嘛！说句不怕您老生气的话，我的钱包比您这位老干部的怕要鼓一点！”还有些话更令我吃惊：“造反有理，文化大革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。毛主席说要进行多次，我真巴不得再来一次！”

我又想找有关部门查阅一些档案资料。有位熟人面有难色，婉转地说：“您老这把年纪何必自找苦吃？现在翻这些老账不合时宜，还是安度晚年享点清福吧！”

四处碰壁，真想打退堂鼓了。之所以在长时间搁笔后还是完成了这本小册子，是基于如下原因：

十余年前由于工作需要，我接触到一些“文革”的资料，无意中保存了一部分。两年前翻了出来，觉得有些价值，如果弃置不用，异日被人当废纸处理，实在可惜。

两年多前酝酿出《雁》书，曾邀集几位有心的友人商谈，初步分了一下工。其中易可、彭章绪、廖祥骥、王芳林、黄耀武、刘学德诸位及已故的周济老，认真对待，作了不少努力，或搜集资料，或撰文，并一再敦促给我打气。他们明知我笔下功夫不行，还是信任我，盼我将此事完成。我这个倡导者之一怎好意思当逃兵呢？

近日读了杨敏之的《一瞬长思——“文革”回眸》，感触很深。他曾任衡阳市市委书记，在省委常委、省纪委书记任上离休后，“一扫过去的种种忌讳，”“以普通人写普通人的平和心态”来写“文革”，正如他在扉页上所言：“这本书的长处，是说了一些真话”。他将“文革”的大背景（全国、中央）、小背景（衡阳、市委）与个人的曲折经历有机地串连起来，将回顾历史与透析现实紧密联系起来，将激荡的情感波澜与严肃的理性思考自然